

一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神命令我履行一个哲学家探讨自己和探讨别人的使命

——《申辩篇》

爱 琴海，这个装满了传说和史诗的海洋，它的琥珀色的海水，就像一位盛大的母亲，诞生过奥林匹斯山上快乐的诸神，也孕育了西方精神最初的灵感。那金子般的阳光撒播到历史的沉沉黑暗之中，那充盈的思想的活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枯竭的心田。

柏拉图，阿波罗的宠儿，就出生在雅典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之中，正是第 88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那一年（即公元前 428 年）。他的父母的家系都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名门望族，并且可以追溯到更加古老的年代。他们的家庭出现过许多对雅典的社会和历史产生过影响的人物。生在这样一个富裕、高贵的门第中，柏拉图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训练和良好的教养，诗书礼乐、弓马刀剑，样样娴熟。渐渐地，柏拉图长成了一个天资聪慧、模样俊秀的小伙子，宽宽的肩膀、高

高的额头、执著而热情的眼睛。等着他的是光华似锦的前程和平坦宽阔的道路。按照雅典社会的传统和他家庭的气氛，他应该成为一名受人敬仰的政治家，把他的才智和精力服务于城邦的公共生活。然而命中注定，他却成为了一个哲学家，而且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位哲学家。他没像他那个年代的政治家一样去征服一片土地，但却开创了整整一个世界——精神的世界。

每一位天才都是一次机遇，世界给天才一次机遇，天才也给世界一次机遇。柏拉图的机遇在于他没赶上雅典最辉煌的时光，否则他将度过另外一种模样的人生。雅典所在的亚底加以前是地道的农业国，靠种植橄榄来维持人们的生计。当荷马的阳光照亮了希腊世界的东海岸的时候，亚底加还处在古代世界的暮云之中。那时，希腊世界的文化盛地是在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和意大利南部。公元前 6 世纪，梭伦的改革和立法为雅典打下了民主政治的基础。公元前 5 世纪的两次希波战争，促成了雅典的迅速崛起。强大的海上力量使雅典一跃成为希腊各盟国的军事头领，海外贸易的增多又给它带来了滚滚的财富。特别是在伟大而贤明的领导者伯里克利的治理之下，雅典社会变得异常兴旺和繁荣。经济发达，文化昌盛，政治清明，对城邦的忠诚对每一个公民来说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然而，好景难长，在柏拉图出生前几年，爆发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之战。在这场残酷的大战中，雅典最后败给了经济文化落后、但纪律严明的斯巴达。战争还带来了肆虐的瘟疫，犹如雪上加霜，致使雅典城的人口损失几近一半。正在内焦外困的时候，伯里克利的政敌又向他发难，一场阴谋迫使他退出了政治生涯，并于柏拉图出生前一年病逝。就像在

许多时代和地区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一个昌盛的文明从此开始江河日下。

失败的痛苦和屈辱刺激了兽性，使雅典人变得变本加厉的凶残。他们开始毫无顾及地到处征战。柏拉图 5 岁的时候，雅典人收复了斯基涅勒，因为它曾支持过斯巴达，胜利的雅典人便将这个城邦的所有男性公民统统处死，并把妇女和儿童卖作奴隶。6 年后，因为美诺斯拒绝加盟雅典，尽管它保持中立，也没能逃脱和斯基涅勒同样的命运。著名的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在《特洛亚的妇女》这出戏中，就借古代特洛亚战争之名，暗喻了美诺斯人的悲惨遭际。

公元前 415 年，雅典又同西西里产生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战斗持续了两年，虽然最后得到了一些地盘，但损失惨重，死者成千上万，折毁船只无数，将军尼希阿斯战死，74 人沦为囚徒，还有许多人被卖身为奴。

公元前 411 年，民主制为右翼集团所推翻，五百人委员会接管了权力，但只维持了两年。接着民主制被恢复，但一些政客大肆煽动雅典人的好战情绪，挑起同斯巴达的战争，结果自食苦果。到公元前 404 年春天，雅典城被迫投降，许多工匠和士兵被俘虏，军队遭解散，民主制被取消，建立了僭主制度，史称“三十僭主”时期。但僭主制毕竟不合乎雅典深厚的民主传统，没过多久，即为新的民主政府所代替。

连年的战争、灾祸，政权走马灯似的更叠，使雅典人失去了平和的心性，而开始变得病态且偏执。民主作为城邦生活的健康的维系力量受到歪曲，以此为基础的公民的忠诚已经丧失，致使雅典社会支离破碎、混乱不堪。法律

成了伪饰和托词，公民大会变成了蛊惑人心的广场。政客们争权夺利、明枪暗箭，公民们结党营私、拉帮结派。似乎人人都在参与着、制造着阴谋。青年柏拉图由于他的家庭关系，目睹了这些形形色色的表演和肮脏的幕后交易，对政治极度失望。在他晚年致狄翁的一封信中曾痛切地回顾了这一段时期的心路历程，他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经历和其他人一样。我认为只要能成为自己的主人，就能参与公共生活。但政治环境发生了命定的转折。政府为多数人憎恨，因而发生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由五十一人领导，其中三十人形成了最高的政治权威，拥有无限的权利。这些人中，有些是我的亲戚和相识，他们邀请我参加他们的管理，只要我愿意。考虑到那时我还年轻，我所经历的并不令人奇怪。我想象他们会很好地管理这个城邦，带领它从不公正的生活方式走向公正的生活。这样我就非常关注他们的所作所为。但实际上看到的一切甚至使我在一个短时期内开始怀念以前的政府，把那时当作黄金时代。……当我亲眼目睹这些和其它一些严重的事情，我便反对并远离这些罪恶。很快，三十僭主和他们的政府便被颠覆。我再一次，虽然不那么迫切地想介入公共事务。但许多悲惨的事件仍不断发生。这不奇怪，在革命中，一些人就会残酷地报复其敌人，虽然夺得权力的党派会相对温和一些。”

政治的腐败连接着道德的颓丧。人心泛散，物欲横流，指导人们行为的传统和神圣已经瓦解，作为公民的精神支柱的城邦统一之神狄克被战火和阴谋击得粉碎。一个声音在旷野中呼告：大神潘死了。失去了神的护佑，人又如此羸弱，不能自己照料自己，到处都是伪善和不诚、谎

言和诡计、肆无忌惮的乖张和无法无天的暴行。对神既不顾虑，对自己也不负责，勾心斗角、互相陷害，朋党之争肆虐无度。这是一个价值危机的年代，是精神上的空白时期。危机还有另外一个根源，就是文化视野的扩展。通过长途征战和广泛的商业贸易，雅典人获知了许多大异于他们自己的传统和习俗。据希罗多德记载，在波希战争期间，一个波斯统治者看到希腊人焚烧掉他们死去的亲属，而意大利人却把死者吃掉，这令他非常吃惊，因此得出结论：“习俗，是万物之王，神和人都为它所指导。”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交往初期所出现的惊异和疑惑。一切都是习俗，雅典人、斯巴达人、波斯人都有自己的习俗，都有自己的神，既然雅典人并非战无不胜，神肯定不是特别垂青于他们。道德上的相对主义甚至反映在人们对语言的使用上。修昔底德曾指出：在雅典的法庭上，当被告人为自己受到的政治迫害进行辩护时，经常巧妙地改变语词的通常含义。

虽然雅典在走向衰落，但它的余辉却仍然光彩夺目。雅典失去了军事霸主的地位，但依旧是希腊世界的文化中心。理智和精神活动兴旺发达，吸引着许多头脑高超的外邦人士云集雅典。柏拉图年轻时可以观赏到伯里克利时期的伟大的艺术家们留下的建筑和雕塑，也可以聆听到荷马的史诗和三大悲剧作家的作品，花少量的钱就可以到剧场看一出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柏拉图在青年时代就熟识赫拉克利特学派的传人克拉底鲁，就是那个说人一次也不能踏过一条河流的人。在雅典，也逗留着许多其它古代先贤的后代，如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勒、阿拉克萨哥拉的传人。从他们那里，柏拉图知道了许

多隐秘的禁忌和多少有点古怪的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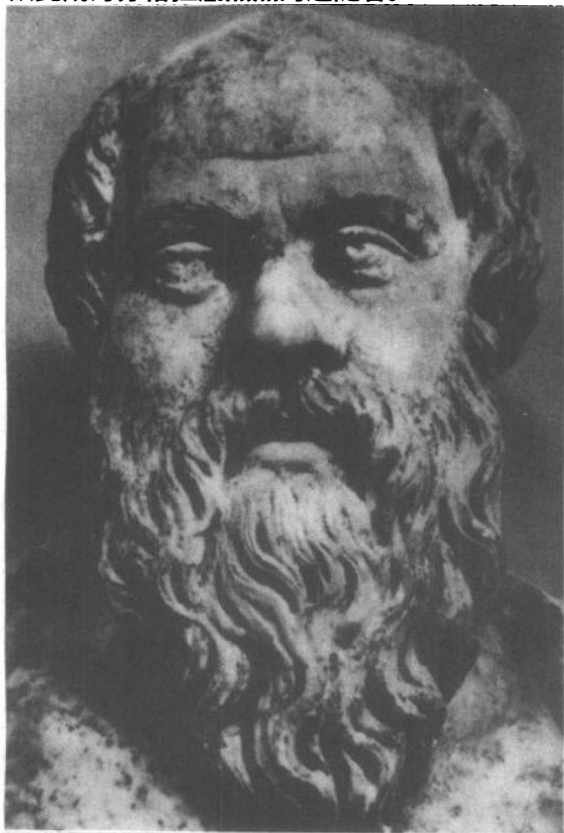
然而在雅典的文化舞台上流行的是另外一类明星，即智者。“智者”的希腊语原义是指聪明人，后来被引申为诡辩家。不过这两个意思都很贴切，他们是聪明的诡辩家。智者是职业性的教师，但他们与毕达哥拉斯那样的教师不一样，不是某个教派的教主。他们是一类人的统称，没有固定的学说和教条，也没有政治和宗教的目的。他们在希腊各邦浪迹，以收徒授业为生。他们所传授的是修辞和雄辩术，培养学生如何在辩论中压倒对手，如何在演说中打动别人。每逢喜庆佳节、重大盛会或者群众仪式，他们便登上高台，或发表动人的演讲，或进行机智的论辩，表演他们的才智，也招徕年轻的学生。智者的技巧里包含着机敏、巧辩和狡诈，它要求充分利用语词上的含混和对手在智识上的弱点，以貌似博学的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造成对手逻辑上的混乱和理智上的困惑，迫使对手俯首称臣。因而他们并不试图去证明真理，也不努力为美德辩护，而是服务于每个个人的私人利益。智者的流行正应合于雅典混乱的民主社会，那些沽名钓誉的政客需要花言巧语去哄骗公众，赢得政治上的权力，而那些有罪之徒也需要利用巧言令舌去说服法庭为自己的罪责开脱。著名的智者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等长期在雅典设讲立坛，门生众多。智者大都是外邦人，他们并不真正关心这个城邦，既不为雅典的幸福和健康操心，也不为它的弊病和缺陷忧虑。他们的所言所为只是为了他们的生活之需。而雅典人对待智者的态度也很微妙。一方面他们从智者身上看到了自己对传统和城邦的不忠，而这是他们所不愿承认的；另一方面则又需要智者们的才能和技巧来为自己争得更大的利益。所以

他们既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普罗塔哥拉那里去学习，最后又将他赶出了雅典。

政客的无耻、公民的愚昧和文化人的堕落，使柏拉图无意恋栈于现世的政治。他放弃了权力的角逐，而转向思想上的斗争，放弃了热闹轰烈的公共生活，而转向孤独空寂的内心世界。但柏拉图的兰惠之心、深切的同情、敏锐的观察和细致入微的体验都还只是一块璞玉，需要一次真正的点化和彻底的震撼。他所孕育的深刻、卓越的思想需要一位高超的精神助产士才能降生出来。柏拉图的幸运，也是我们的幸运，是他遇到了这样一位大师——他的忘年之交和精神教父苏格拉底。从此，柏拉图的生活注定要与这位石匠和接生婆的儿子连在一起。这位丑陋而强健的人使柏拉图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这是历史上那些重大的相遇之一例，他们的相遇既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又影响了世界思想的进程。如果苏格拉底不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出现，他的重要性就要逊色得多，最多给人们留下一个言多必失的牺牲品的印象。而如果柏拉图没有苏格拉底的调教和启迪，他就只是一个满怀忧郁、愤世嫉俗、性格孤僻的贵族青年，而不会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人物。正如他们的辩证法所要求的，思想正是在相遇中被提高并被编织进探索的永恒的进程之中。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相遇来自于一种机缘和天性，是思想史上极富戏剧性的一节，似乎是来自于最隐秘的神的动机和暗示。据说，在苏格拉底遇见柏拉图的前一夜，他梦见在他的膝头上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只雏天鹅，这只天鹅慢慢长大，逐渐羽翼丰满，最后翱翔上天际，唱出甜美的歌声。而柏拉图在剧场前面第一次听到苏格拉底的谈话后，顿有

所悟，欣喜若狂，当场烧掉了他所喜爱的悲剧诗人的书籍，从此成为苏格拉底热烈的追随者。



苏格拉底头像

苏格拉底不是智者那样的职业教师，他不靠收徒授业为生。他的家道尚属殷实小康，至少有一间大的房宅、一个仆人，还有一个虽嫌泼辣但还算能干的妻子为他操持家务、养育孩子。后来可能由于他太过于“照料自己的灵魂”，而少照料自己的生计，逐渐开始囊中羞涩、捉襟见

肘，因为他在死前专门关照过克力同别忘记替他交还他向别人家借的鸡。苏格拉底曾说：“财富并不能带来美德，但美德能够带来财富和其它好处”。但似乎苏格拉底的美德并没有使他的财富有所增益，反而有所亏空。苏格拉底就像他称呼别人的那样，是一个“没有才智，除了真理以外任何事情都毫不介意的游手好闲之徒”。而在他周围聚集着一群雅典贵族家庭出身的青年才俊。他的追随者中不乏日后声名显赫的人物，有一位成为了三十僭主之一。柏拉图的叔叔查密得斯、哥哥阿达曼图斯和格老贡也长期不离其左右。

这个只追求真理的浪子看起来确乎有些古怪，人们在公共场所能够经常见到他：身材粗壮，宽袍大氅，赤脚露怀，神态自信而超脱。在大街上、广场中、剧院前，他踱来踱去，与他遇到的人交谈，或者旁若无人地陷入沉思。有人说他曾在雪地里站了整整一夜，冥思苦想着一个艰深的问题。大多数雅典人都认为他不是一个好公民，不会为他的城邦做些什么，虽然他曾经舍生入死地为雅典战斗过，而且在战斗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勇敢和镇定。他们觉得他的行为怪异、举止可笑，谈吐更是荒诞不经，像疯子那样不入主流、难以理喻。阿里斯托芬在喜剧《云》中，把苏格拉底表演成一个插科打诨的滑稽丑角，博得雅典人哈哈直乐。

但是神说：苏格拉底是最智慧的人。这条消息来自于他的朋友卡诺丰。卡诺丰曾到德尔斐神庙求签，问问当今之世谁是最自由、最公正和最智慧的人。神答曰：苏格拉底。当卡诺丰兴奋地将神谕到处传播的时候，苏格拉底自己却陷入了困惑。他自忖自己一无所知，可神怎么会有意

撒谎呢？他决定着手查明这条神谕的真实含义。于是他便放弃了其它事务，遍访当世为人公认而且也自认如此的有智慧的人，包括工匠、诗人和政治家等。结果令人大失所望，这些人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有智慧。工匠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诗人创作诗歌但却不了解它的含义，政治家竟不知公正为何物。他逐渐悟出，只有神才是真正有智慧的，神之所以说他有智慧，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

就这样，苏格拉底不为俗务所缠、不以私利为念，一心一意地探索着别人，同时也探索自己，因为“神命令我履行一个哲学家探讨自己和探讨别人的使命。”苏格拉底对于自己的使命深信不疑。他自言自从小时就有一种声音，一种“灵机”时常在脑中出现，它引导着他的一切。所以甚至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仍然坚定地说：“只要我还有生命和力量，我就决不停止实践哲学与教导哲学，并劝勉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苏格拉底劝勉人们要“照料自己的灵魂”，要关心自己的美德，而这就要像德尔斐神庙中高悬的铭文“认识你自己”，因为美德就是知识。在他看来，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的活动要成为理性的、公正的和健康的，不单是要对方法进行策划和算计，而且要思考行为的真正目标。人的完善、社会的幸福必须依赖于人的条件和可能性，因而首要的是要达到自知。而自知离不开对别人的了解，他把这称之为“辩证法”，即交谈的艺术，并戏言他自己继承了母亲的职业——接生婆，不同的是他是帮助别人把他们自己的精神降生出来。所以，正如他的另一个弟子色诺芬描述的那样：他（和那些自然思想家相反）总是谈论着人间的事情，探索什么是虔敬、不虔敬；什么是美好的，什

么是羞耻的；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什么是节制，什么是疯狂；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懦弱；什么是政治、政治家；什么是为人所统治的，什么是能够统治人的。他探索着他认为能够使人成为其应是的一切，对这些的无知，他认为是人的屈辱。

这种探索不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穷根究底的癖好，或者是个人的智力上的愉悦，而是为了改善人和人的生活。在他那里，还没有知识之树和生活之树的区别。追求真理就是热爱生活，因为真理是生活的最根本的原则，需要人们终生地实践才能找到最高的目标并向着它上升。而上升就需要克服下坠之力，就需要斗争。他热爱雅典，他在这里出生、在这里生活，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雅典的法律就像母亲一样哺育他成长，即使当他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他也不愿意背叛她、弃她不顾。他曾为她而战斗，也要为她而死亡。因为他希望他的母亲之邦更加健康和幸福。但是，他决不附合他们、纵容他们，他的使命不允许他袖手旁观、冷眼置之，更不允许他同那些损害雅典的罪恶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他说：“雅典人啊，我尊重你们，爱你们，但是我将服从神而不服从你们。”因为他知道神的智慧才是对雅典真正有益的东西。他不停地劝勉、教诲着所有的雅典人，正是为了改善和提高他们。他自称是神派来的一只牛虻，要刺激雅典这头疲惫的老牛奋发向前。

但雅典人却并不善待这只满怀赤子之心的牛虻。他们不理解他，甚至对他充满了敌意和恼恨。他伤害、刺痛了他们，打乱了他们舒适的生活，侵扰了他们悠闲的清梦，更加危险的是他在破坏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古老的传统和习俗。还是在“三十僭主”时期，就因为苏格拉底不与他们合

作，他们就用阴谋手段把他诬陷为罪犯的帮凶，并送上法庭。甚至到他 70 岁高龄的时候，新的民主政治的首脑们也不放过他，以致于要判处他极刑。雅典人决心永远驱赶走这只恼人的牛虻。公元前 399 年，由不出名的年轻诗人美立都和安尼图斯出面状告苏格拉底，其主要罪状有两条：第一、对城邦的神不虔敬；第二、败坏青年人。最后他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气度恢弘，并且仍然没有忘记他劝勉的职责。他没有让他的妻儿哭哭啼啼地为他求情，放弃了以罚代刑的选择，也拒绝了他的学生和朋友们帮助他逃出雅典的计划。他绝不会这样来苟且偷生，因为生对他来说有另外的含义，因为他知道为雅典而死是他最完满的结局。

苏格拉底死了，那么平静、高贵而从容。他的灵魂飞升到了他确信更高、更幸福的境地中。他不相信雅典人对他执行死刑是对他的惩罚，因为他并不认为死亡是一件坏事、一场灾难。他说，死亡可能像一次永久的睡眠，这并不很坏，死亡也可能是灵魂转移到了另外的世界，这当然更好，在那里他能继续和死去的先贤们对话，继续他对知识的探索，而那里决不会因为一个人提出问题就把他处死。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愿意一死再死。摆脱了死亡的畏惧，苏格拉底完成了真正的超越，生对他来说呈现了全新的含义。如果不把死亡当作绝对的虚无，他就确定了人生的最高价值，那就是灵魂的价值、知识和美德的价值。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唯有这些才是永恒的。肉体易逝而灵魂长存。这样我们就不会斤斤计较于荣辱得失，更不会耽念于尘世的沉浮兴衰，也不会为肉体之欢、感官之乐而疲于奔命。我们就会变得更加纯洁、更加美好。抖落了欲望

的铁链，我们就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灵魂就能在云空中畅然高翔，沐浴在温暖、平和的幸福之光中。苏格拉底用平静而超然的声音向雅典人道别：“分别的时候到了，让我们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你们去活，哪一个更好，唯有神才知道。”

一个天才的死催生了另外一个天才。苏格拉底像一只燃烧的凤凰，熊熊的烈火点燃了另一个人的灵魂之灯，并使他的生命在柏拉图身上得到了再现和永生。苏格拉底之死深深地震撼了柏拉图年轻的心灵。他曾亲眼目睹了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动人场面，之后便大病一场，甚至没能为他的恩师送别，没能聆听到他最后的天鹅之歌。雅典使他看到了苦难和罪恶，看到了人的丑恶可能造成多大的灾祸。而在苏格拉底闪耀神性的光辉中，他看到了人的另外一种可能性，看到了爱的力量可以造就多大的伟业，看到了知识和美德如何使人成为他所应是的一切，看到了对现实世界真正的超越。从此，柏拉图走上了一条灵魂的上升之路。他的哲学就是在苦难中救助的希望，在爱中升华的阶梯，在美德和知识中克服罪恶和堕落的力量，在对永恒幸福的追寻中，在对现实的不断超越中，最终找到了迷失了的人的自身。

苏格拉底死后，雅典不再是柏拉图平静的栖身之地。那里有太多的罪恶、太多的迫害、太多的令人悲伤的往事。柏拉图此后离开了雅典，浪迹天涯，四处游方。他到过麦加拉、居勒尼、意大利甚至更远的埃及。在埃及，他看到了许多新奇的风土人情。在意大利，他目睹了富人的奢侈淫靡。在西西里，他接触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残余，了解到更多的这个学派的思想。长期的游历，使他眼界大

开、阅历广博，思想逐渐酝酿成熟。到他不惑之年的时候，柏拉图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并建立了一所自己的学园。学园设在郊外的一座大花园里，因邻近阿加德木斯运动场而被称为阿加德米（Academy）学园。在学园里，柏拉图找到了自己要从事的真正的工作，也找到了实现自己抱负的基础。他按照自己的理想，首先对学生进行算术、几何、天文学和声学等等的训练，这些科目可以培养学生对纯粹抽象思维的喜爱和能力，也要教授治国之术和政治方略。柏拉图的教学经常不用手稿，而是和苏格拉底一样，与学生交谈，提出问题，相互辩驳。与此同时，柏拉图也开始了对话录的写作，他酝酿已久的思想像火热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大多数我们熟悉的对话录的篇章都是在这段时期完成的。学园在社会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许多优秀的人士和贵族显达的子弟都纷纷前来加入。学园出身的人中不乏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还有一些在本地的政治中锋芒毕露的人物。当然，园的最大贡献还是培养了亚里士多德——马其顿菲力浦王的御医尼各马可的儿子。他从 18 岁就来到学园，并在那里度过了整整 20 个春秋，直到柏拉图去世为止。亚里士多德后来取得了和他老师不相上下的名望和成就，他们两人的名字长期以来成为西方思想发展中或明或暗的两条线索。

柏拉图在学园里教学、写作，过了 20 年的安谧平和的生活。但公元前 367 年，发生了一件事，打破了柏拉图多少有点超脱的生活，并把他拖入到现实的政治斗争之中。这件事的起因还是柏拉图 20 年前游历西西里时的一次巧遇。他结识了一位才华出众、前程远大的青年人，这人正是叙拉古的君主狄奥尼修一世的女婿狄翁。狄翁深为



柏拉图的知识才智所折服，后来也成为学园的学生。在我们提到的这一年，狄奥尼修一世去世，新君主狄奥尼修二世尚为一个年幼无知的孩子。新君主的姐夫狄翁便邀请柏拉图来承担教育这位小皇帝的职责。起初，师生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柏拉图首先对学生施行几何学的训练，一时间几何学竟成为宫廷中的时髦品。但后来狄奥尼斯二世与狄翁严重失和，竟至冲突，结果狄翁遭到放逐。面对这种

情况，柏拉图只好返回雅典。为了挽回这对政敌的关系并促成他俩和解，柏拉图曾再度亲赴叙拉古（公元前 361—前 360 年）。他倡导狄奥尼修二世实行各派合作，把叙拉古建成一个强大的君主立宪国家，并拟定了新宪法的序言。但他深陷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处境艰难，殊难施展他的抱负和才华，甚至面临威胁和危险，只得抱憾而归。

狄翁并没有善罢甘休。他联系了一些学园的学生，并招募了一支雇佣军，于公元前 357 年成功地打回了叙拉古，消灭了对手，登上了权力的宝座。柏拉图向他写信祝贺，同时提醒他不要穷兵黩武，希望他像学园的理想那样树立一个美好而正义的典范。狄翁虽是个铁血人物，但却缺乏权变之术，根本不能驾驭同僚和下属。结果他在一场政变中被推翻，并被置于死地。

柏拉图度过了几年短暂的政治生活后，又恢复了学园的生活。他仍然热心教学、勤奋著述。他的一些最成熟的作品就是在晚年完成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柏拉图开始垂垂老矣。一次，已届耄耋之年的他被邀请参加朋友的婚宴，席上略感不适，便退至屋角，在那里他静静地长眠于世，享年 80 岁，时值公元前 347 年。

柏拉图的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述”，另一个是“作”。正如亚里士多德介绍的，柏拉图讲课常常不用手稿，而是现场交谈、论辩，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达到心智的启发。但是时光的一去不回使我们不能再“亲聆”这些教诲，只能从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一些学园学生的著作的简短附注中才能略为窥知。

但柏拉图与苏格拉底不同，苏格拉底是述而不作，柏拉图却留下了大量完整的文字作品。这些著作之丰是古典

时期甚为罕见的。以柏拉图的名义留传下来的作品共有 35 篇对话录和 13 封信札。这些作品的真伪和年代顺序如何，很早就成为众多学者考证、注疏的问题。不同的判断会影响到对柏拉图思想的不同理解和评价。有的以亚里士多德的提及为标准，有的以文体风格为理由，还有的以书中涉及的人物和事件为根据，互相间争执不休。但是近年来，学者们的观点有所趋近，除个别仍有争议的篇什外，可以肯定有 23 篇对话录确系出于柏拉图之手，其余的皆是伪托。伪托的情况也有所不同，有些出自柏拉图的弟子，有的出自年代稍远的后代。在 13 封信札中，一般认为可信的有第 6、第 7 和第 8 封。

柏拉图的全部篇章在内容、风格和文体的复杂性和精致性方面差异很大。许多学者由此来确定柏拉图每篇对话的年代和顺序。按照公认的做法，全部对话作品分成不同的组，相应于柏拉图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

1. 与苏格拉底相近的对话，包括《申辩》、《克力同》、《查密德斯》、《拉黑》、《尤叙弗伦》、《普罗塔哥拉》、《美诺》、《尤息底模斯》、《高尔吉亚》、《李思》；
2. 表述柏拉图早期思想的对话，包括《克拉底鲁》、《会饮》、《斐多》、《理想国》前几章；
3. 表述柏拉图中期思想的对话，包括《理想国》后几章、《斐德鲁斯》、《泰阿泰德》、《巴门尼德》；
4. 表述柏拉图晚期思想的对话，包括《智者》、《政治家》、《斐利布斯》、《蒂迈欧》、《克力锡亚斯》和《法律》。

柏拉图的全部作品除《申辩篇》转述的是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演讲辞和信札外，其余都是采用对话体的写作手